

“全球治理”学科知名研究者
“全球安全文化”概念提出者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创始成员

玛丽·卡尔多 最新作品

全球安全文化

[英] 玛丽·卡尔多 (Mary Kaldor) | 著 李 岩 | 译

Global
Security Cultures



“文明冲突论”能否摆脱？ | “修昔底德陷阱”能否避免？ | “金德尔伯格陷阱”能否跨越？

人类社会与民族国家避免冲突和战争的四种安全文化

地缘政治 · 新型战争 · 自由主义和平 · 反恐战争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全球安全文化

[英] 玛丽·卡尔多 (Mary Kaldor) | 著 李 岩 | 译



Global
Security Cultures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北京 · 2019

本作品一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未经授权，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安全文化 /（英）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著；李岩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9.4

书名原文：Global Security Cultures

ISBN 978-7-5155-1830-5

I. ①全… II. ①玛… ②李… III. ①国际问题—安全文化—文化研究
IV. ①D8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33971 号

全球安全文化

著 者	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
译 者	李 岩
责任编辑	李 涛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
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830-5
定 价	5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100102）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投稿邮箱	balimist0213@163.com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18911105819

Global Security Cultures

Mary Kaldor

Global Security Cultures
Copyright © 2018 by Mary Kaldor
Original English edition published by Pol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GOLD WALL PRESS.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Polity Press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序

非常高兴能够向中国读者介绍本书。本书写作于国际规则和规范遭到破坏这样一段全球至暗时期——在发生暴力冲突的地区尤其如此。本书试图分析全球安全形势，以发现那些可能扭转这些趋势并促成一系列新的、与这个时代更加合拍的国际安排的开口。中国对于塑造全球安全的未来走向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观念构成了本书的出发点：世界正处于深刻的转型时期。我们正在见证美国主导的，以大规模生产、大量使用石油、高度物质消费和军国主义为特征的发展模式的终结。我们正在转变为某种信息与通信技术将发挥核心作用的新型发展模式。这一转型时期的关键要素之一便是安全。我使用“全球安全”（Global Security）一词来指代应对大规模暴力事件的方式，这些方式不一定是军事性的。在本书中，我提出了“全球安全文化”（Global Security Cultures）的概念，以解释为何在全球层面上调整促成安全的方式、令其适应当下的挑战，是如此困难。安全文化包括组织、叙事、工具、规则以及与特定形式的政治权威（通常是国家）相关的基础设施。可以说，有关安全的思维方式、个人的职业生涯以及经济利益是深陷在某种特定的安全文化或安全路径之中的。尽管如此，安全文化中也存在着可能导致分叉或是开口的矛盾之处。例如，外部的突发事件、财政上的限制，或是成功的试验。

在本书中，我探讨了当前典型的四种全球安全文化。冷战期间，“地缘政治”是最主要的安全文化模式，由旨在进行大国间战争的常规军事力量构成。虽然越来越不适用于当前的形势，但它依旧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安全文化，并且吸收了大量资源。在这个相互联系的时代，大国间的战争已经过时了。我所谓的“新型战争”安全文化演化自冷战时期地缘政治遭遇的主要挑战——革命战争，以及反暴动的回应方式。“新型战争”安全文化包括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

体（准军事组织、军阀、民兵、犯罪团伙和圣战者等）组成的网络，这些行为体不是从战争的胜败、而是从暴力行为本身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此类战争之间的相互联系愈发加强了，而且十分难以终结。

“自由主义和平”诞生于冷战时期的联合国使团，此后经历了急剧扩张。它包括大量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维和部队，以及警察和其他文职专家。尽管这种安全文化处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中，但仍然深陷于传统战争观念，未能将新型战争那错综复杂的社会逻辑考虑在内。最后，我还将美国的新式“反恐战争”策略列为一种新型全球安全文化，因为它也包含了一系列新的行为体（私人安保承包商、情报机构、无人机及特种部队）和新的策略（大规模远程暗杀）。

我的核心论点是，是否能够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取决于自由主义和平安全文化的演化。必须减少对自上而下的和平协定与旨在将冲突各方分隔开来的维和行动的重视程度，转而更加重视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增强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努力。这些举措包括保护平民、赋予司法机制更大的作用，以及更加重视发展和具有合法性的生存之道。我将这种方式称为“第二代人的安全”，以便描述“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这一观念的实际践行情况。

和其他大国的情况一样，地缘政治依旧主导着中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不过，中国在自由主义和平领域也发挥了愈发重要的作用。“新型国际关系”关注的是全球层面的互利合作。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中对维和行动贡献力度最大的国家。除常备的维和警察外，中国近来还创建了一支 8000 人的维和后备部队，并正在就区域性维和措施展开讨论，以便应对周边地区的暴力冲突问题。中国的一大特别贡献在于强调发展和基础设施，而不是像自由主义和平通常所做的那样强调以市场为导向的一套教条。和欧盟一道，中国还是依旧将自由主义和平置于优先地位的主要大国之一。

最后，我要感谢李岩先生翻译、金城出版社出版本书中文版。

玛丽·卡尔多

2018 年 12 月 21 日

致 谢

我非常感谢欧洲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简称 ERC）为“转型中的安全：对于安全鸿沟的跨学科研究”（Security in Transi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Security Gap）这一为期五年的研究项目提供资金，这一研究项目正是本书的写作基础。我还要感谢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UK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简称 ESRC）和科学与技术实验部（Departmen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boratories，简称 DSTL）为另一项名为“对于通往安全之路的战略性治理”（Strategic Governance of Pathways to Security）的补充性研究计划提供资金，该研究计划关注的是技术在安全文化中的作用，并且对于深化本书的观点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我还想感谢这两个研究项目的团队，我们进行了激动人心且卓有成效的讨论与合作。

我还要特别感谢萨姆·文森特（Sam Vincent），他列出的关键书目令我得以完成本书的写作，还帮助我在华盛顿特区及其他地方进行了访谈，他论述无人机和反恐战争安全文化的作品也令我受益匪浅；特别感谢萨拜因·塞尔霍夫（Sabine Selchow），她帮助我拓展了思维的边界，并与我一道提出了“安全文化”的概念；特别感谢克里斯廷·钦金（Christine Chinkin），在写作本书的同时，我正在与她一道进行《国际法与新型战争》（*International Law and New Wars*）一书的写作，这对于增进我对本书主题的理解大有帮助；特别感谢多梅尼卡·斯皮拉图（Domenika Spyraou），她负责研究的管理工作，并驾驭着思想上和行政上各种错综复杂的局面；特别感谢亚沃尔·兰格洛夫（Iavor Rangelov），他帮助我推动欧洲研究委员会的项目，并且将“文化”概念运用于正义领域；特别感谢阿努克·里赫特林克（Anouk Rigterink）为我提供数据；特别感谢里姆·土库曼尼（Rim Turkmani）向我解释叙利亚的局势，以及她关于战

争经济和“伊斯兰国”的作品，在这方面还要感谢阿里·阿里（Ali Ali）；特别感谢韦斯娜·博伊契奇-哲利洛维奇（Vesna Bojicic-Dzelilovic）和德尼莎·科斯托维科娃（Denisa Kostovicova）对于波黑的洞见以及在这方面为我提供的帮助；特别感谢弗洛里安·魏甘德（Florian Weigand）和马里卡·特罗斯（Marika Theros）帮助我了解阿富汗局势的进展；感谢鲁本·安德森（Ruben Andersson）对于“安全文化”概念做出了极具价值的评论及其关于马里的作品；感谢詹姆斯·雷维尔（James Revill）关于新型战争和简易爆炸装置的作品；感谢保罗·奈廷盖尔（Paul Nightingale）在技术与文化问题上与我的合作；感谢斯特凡·包霍维茨（Stefan Bauchowitz）在德语文献方面为我提供的帮助；感谢沙拉卡·塔库尔（Shalaka Thakur）在“地缘政治”这一章提供的协助工作；最后，感谢朱利安·罗宾逊（Julian Robinson）就相关观点进行讨论，将其运用于化学战争，并仔细阅读手稿、对我予以鼓励。

我还要感谢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的审校人员，尤其是詹姆斯·德尔·德里安（James Der Derian），他那富有建设性和详细的点评是极有帮助的。

在写作本书期间，我还是英国国际发展部（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 DFID）资助的“正义与安全研究项目”（Justice and Security Research Programme，简称 JSRP）的首席执行官。为该项目进行的研究与讨论对于本书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关于新型战争与自由主义和平的章节。因此，我还要感谢该项目的所有同事。

前 言

在本书写作之时，存在着一种颇为类似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不祥预感，就好像 20 世纪糟糕的世界性悲剧又将重演一样。事实上，这一悲剧已经在发生：难民溺亡于地中海，医院与医疗设施遭到轰炸，数千名青年男子（也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遭到无人机、巡航导弹和战斗机的远程杀戮，神经毒气、燃烧弹及集束炸弹等被国际法禁止的可怕武器被投入使用，性奴死灰复燃，老百姓因遭遇围城而陷入饥荒，在拥挤的城市中货车和飞机被用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无辜者遭到斩首、监禁与酷刑折磨。任何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人都希望上述现象永远消失。然而，我们正在经历的并不是 20 世纪的那种战争，而是别的东西。

本书试图解释这种“别的东西”。我将使用“全球安全文化”这一概念工具来帮助我们描述或解释正在发生的情况，以便提出可能的解答。“安全文化”指的是反映了蕴含在对安全状况的某种解读之中的规范与标准的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或一系列具有社会意义的活动，它是深植于政治权威或各种权力关系的具体形式之中的。安全文化由相互联系的各种理念、规则、人口、工具、策略及基础设施共同组成，并且与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威相联系，共同应对或是参与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文化”一词有助于解释为何即使某些活动看上去不合逻辑，也会变成习惯与规范。例如，在“9·11”事件发生 16 年之后，当恐怖主义这一现象已变得前所未有地普遍，为何仍在用军事手段打击恐怖分子？当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叙利亚、马里、索马里以及其他各地的战争令形势雪上加霜时，为何政客还会觉得战争是应对恐怖之道？为何叙利亚或是民主刚果等地的冲突永无休止？为何当显然毫无胜算时，武装团体还要继续作战？本书的论据是：从该文化的视角来看，此类行为是有道理的；文化构造了叙事、职业生涯路径、物质激励与政治权力，并反复灌

输思考及行事的方式，令其显得理所当然。

之所以使用“安全”一词，是因为应对大规模暴力行动的方式并非都是军事性的。军事史中对不同战争方式的描述颇多，即与不同时代相关联的所谓不同“军事范式”，¹比如封建骑士、宗族战争、奴隶军队、工业战争、游击战，等等。安全文化类似战争方式，但不一定涉及武力。本书的核心论题之一是，由于技术变革的缘故，武力的效用也发生了转变。由于各项军事技术的杀伤性和精确性均在不断增强，各方作战能力间的差距也就缩小了。结果就是，对于强制推行秩序——或者用军事术语来说就是“强迫”——而言，武力这种工具变得过于笨拙了。常常被指出的一点是，美国的军事实力比其他所有国家之和还要强，它拥有训练精良、专业、配备有当下最先进武器的军人。但美国却无法在阿富汗或伊拉克等地强制推行秩序。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一样，常规战变得极具破坏性，且难以取胜。车臣的格罗兹尼、伊拉克的费卢杰和克罗地亚的武科瓦尔等城镇即使已被夷为平地，但战斗结束后，叛军仍会再度兴起。这并不是说动用武力是没有效用的，而是说对于参与军事行动者而言，效用不仅限于战斗的胜负，还存在着接下来数章将讨论的政治、心理或经济等方面的效用。

与此同时，安全文化不仅仅是某种并非一定是军事性的、应对大规模暴力行动的方式。安全还与权威和权力密切相关。只有当要么通过激发恐惧、要么是因为该文化符合有关安全的主观感受，从而巩固了对于政治权威的信念时，这种安全文化才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安全文化是如何被一系列特定的权力关系所塑造并塑造一系列特定的权力关系的，才能够理解各种安全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

“全球”一词用来吸引读者关注安全文化是如何促成安全及各种行为模式的，而不是关注各国或各族群的文化。在战略研究文献中，“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一词被用来描述各国不同的战争方式。我关注的是促成安全的不同方式。这些方式是跨越国界的，

1 约翰·基根（John Keegan）：《战争史》（*A History of Warfare*），兰登书屋，1994年；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欧洲历史上的战争》（*War in European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且源于当今世界的互联互通性，但依旧根植于权力之中。在冷战期间，世界局势的特征可以被总结为所谓“单一的国际安全文化”。各民族国家及民族国家集团拥有常备军及相应的军事装备，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则被认为是以 19、20 世纪的欧陆战争为模板的国家间战争。军费开支的规模和军事装备的数量及复杂程度被认为能够表明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未来的冲突中能够有何种表现，这一点又确立了国际体系中的实力排序。就国内情况而言，在以权利为基础、实行法治的社会与更具压迫性的社会之间当然存在着差别。相较之下，如今我们面对的情况是，多种全球安全文化正在相互竞争。这些安全文化既是国际的，又是国内的；既是“外部的”，又是“内部的”，并且与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威联系在一起。

区分不同的安全文化、关注促成安全的不同方式，对于围绕着干涉战争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富有启发意义。¹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将干涉战争的各种方式都混为一谈，并认定无论如何应避免干涉战争——至少具有批判性的学者是持有这种观点的。然而，在这个互联互通的时代，完全不干涉是做不到的。问题更在于，对战争的干涉是否经由国家或国际机构等政治权威掌控；其目的是在于终结战争，还是协助战争中的这一方或那一方；以及通过何种方式达到上述目的。

在本书中，我区分出了四种主要的安全文化，尽管彼此之间多有重叠之处，而且当然还有可能利用同一种方法辨识出其他类型的安全文化。第一种是“地缘政治”（Geo-Politics），即冷战时期那种以军事力量和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安全文化。第二种是“新型战争”（New Wars），即与次国家一级政治权威相关联的各种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网络的兴起。第三种被我称为“自由主义和平”（Liberal Peace），即在联合国或是欧盟、非盟等地区组织的统领下，将维和

1 玛丽·卡尔多、萨拜因·塞尔霍夫（Sabine Selchow）：“从军事干涉到‘安全干涉’：当代另一种干涉方式”（“From Military to ‘Security Intervention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Interventions”），《稳定：国际安全与发展杂志》（*St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2015 年第 4（1）期，第 32 页。

行动者与一系列国际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结合起来。第四种是“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这里涉及诸多新的行为体（例如情报机构、特种部队和私人安保行为体），以及诸如大规模监视和无人机等新技术。反恐战争与美国例外主义紧密相关，尽管许多其他国家也在沿着美国设定的路径前进。

本书是为期五年、名为“转型中的安全：对于安全鸿沟的跨学科研究”项目的成果。该项目主要关注的是从冷战时期的安全模式到一系列不同的安全安排的转型过程。“安全鸿沟”一词反映了这样一种想法：冷战时期的安全模式不再适用于当代了。“安全鸿沟”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数百万人生活在深度不安全的状况下，但我们那主要由军事实力构成的安全机器却无力应对这一问题，反而常常令其雪上加霜。这一研究计划萌生之时，尽管经历了“9·11”事件，但人们依旧沉浸在后冷战余晖的乐观情绪之中，于是希望该计划能够具体落实前述观点，提出别样的促成安全的建议。尤其令我全神贯注的是关注点在于个体安全而非国家安全的“人的安全”这一概念，以及通过何种方式才能落实“人的安全”。

在我们进行这项研究的同时，战略研究界也在关注新技术会对军事造成何种影响。曾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以及曾任其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都认为，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对于军事行动的意义之重大就如同封建时代马镫的发明或是 20 世纪内燃机的发明一样。美国的国防分析人士延续了早先苏联人的笔调，谈论“军事革命”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简称 RMA）已达十来年时间。我们的观点是，这场转型不仅仅关乎技术。我将在第二章中指出，军事革命最终以一种不扰乱现存组织架构的方式，将新技术引入了“地缘政治”这一安全文化之中，只是令现存的庞大而笨重的武器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和昂贵了。

因此，我们希望这一研究项目能够从社会关系、新的组织方式、新的策略和战略等方面就如何应对当代的不安全问题提出新观念，而不是只从技术角度出发，尽管新技术同样是重要的。在研究项目进行期间，令我感到痛苦的是意识到了自己的乐观情绪是多么不切

实际。促成安全的各种方式的确在发生改变，但并未沿着促进“人的安全”的方向前进。新型战争在截然不同的行为框架内采用了新技术。在巴尔干、中东或是非洲等地参与现代战争的武装团体能够组成松散的网络或联盟，这主要得益于通信技术的改善。他们还有能力开发出所谓“非常规技术”（Vernacular Technology），例如将日常原料和手机等复杂的引爆装置结合在一起的简易爆炸装置。¹ 他们的策略至少部分源自避开密集的高科技军事力量的需要。

同样重要的是，在 21 世纪头十年结束之际，出现了通过反恐战争促成安全（或是不安全）的新方式，即利用大规模监视和无人机技术，执行远程“杀戮或俘虏”行动。

对于分析这些进展而言，最能提供帮助的洞见在于意识到“安全”是一个极为含糊不清的概念。一方面，它意味着安定与无所顾虑；另一方面，它又指的是某种机构或一系列行动：门锁、机场扫描器、福利预算、警察、军队，等等。安全鸿沟实际上是一项相当琐碎的提法，因为它含有将苹果和梨进行比较的内容，对目标（即安定）及行动的界定也存在巨大差异。我将在第一章中讨论，从有关安全问题的学术文献中就能观察到这种差异。有些学者全神贯注于安全问题的目标，即谁的安全（是个人的、国家的，还是世界的），以及免于何物的安全（是暴力、贫困，还是自然灾害）；另外一些学者则更加关注与安全问题相关的实际行动。² 研究“安全化”（Securitization）问题的学者就属于后一类，他们指出：通过操演安全行动，我们便关注到了操演内容的紧迫性，同时也会尊重和服从那些负责进行操演的人物。例如，当我们在机场接受安全检查时，便会受到这样的提醒：存在着恐怖主义威胁，我们应当为政府保护我们免受该威胁而心存感激。冷战期间，在民主德国进行的部署导弹的军事演习也

1 詹姆斯·雷维尔（James Revill）：《简易爆炸装置：新型战争的范式性武器》（*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 The Paradigmatic Weapon of New Wars*），帕尔格雷夫出版社，2016 年。

2 尤其重要的是一群公然用关于行动的话语来分析国际政治问题的学者。例如，伊曼纽尔·阿德勒（Emmanuel Adler）、樊尚·普利奥（Vincent Pouliot）：《国际行动》（*International Practices*），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 年。

有着类似的作用。这一行动告诉我们，世界大战将是可能发生的最为糟糕的事情，西方联盟则是保护我们、避免这一噩梦成真的堡垒。

安全文化将目标与实际行动融合了起来。它有助于解释目标和实际行动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文化都是构建出来的，再生产出来各种文化的诸多机制（金钱、经验、技术）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改变，尽管它们往往倾向于沿着规定好了的路径前进。这一方法使得我们能够发现可能催生别样路径的开口，即矛盾之处或是专项实验。致力于“人的安全”的这一方法在当下错综复杂的各种悲剧中——这正是当下的变化方向所造成的后果——仍能找到一条出路。

作为我们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我的一位博士生要前往阿富汗进行田野调查。我所任职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对于我们是否进行了适当的风险评估以及这对学校的保险单会造成何种影响感到担心，于是便雇佣了一家私人安保公司进行新的风险评估。不幸的是，该公司的一名雇员在此前一周遇害了，于是其他人就只得待在受到保护的基地之内。因此，这项任务又被分包给了 G4S（杰富仕）公司。¹ 我的学生和阿富汗同事一道生活在喀布尔的一间大院里，他极度担心 G4S 会开着一辆装甲车，招摇过市地上门拜访，从而令他及其同事成为袭击的目标。幸亏 G4S 同样觉得走出基地之外是太过危险了，于是决定通过电话来完成风险评估。该公司的评估报告建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研究人员配备装甲车和安保人员等保护措施。丝毫不令人意外的是，G4S 还表示自己乐于提供帮助。

这则故事揭示了两种安全文化：其一，是根植于安保公司、保险公司和设备提供商心中的“硬性”安全文化；其二，则是研究人员所持有的“软性”安全文化，其特征是保持低调、融入当地社群、

1 据说 G4S（Group Four Securicor）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安保承包商。它赢得了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的安保合同，但却无力执行这一合同，最后还是不得不依靠英国军队。其运营的监狱发生过暴乱，其执行的遣返任务造成了人员死亡。2016 年 6 月，导致美国历史上最糟糕枪击事件的奥马尔·马廷（Omar Mateen），也是该公司的一名雇员。

通过熟知田野调查地区情况来避开危险的时间与地点。后一种模式同样有其社会基础，即人种学的方法以及外国研究者与本地人建立起来的联系。

这则故事还说明了对我将在本书中加以研究的不同安全文化进行思考会产生何种益处。在第一章中，我将提出“全球安全文化”的概念，并揭示它与“战略文化”以及萨森的“集聚”、阿德勒和普利奥的“行动共同体”、弗里曼的“技术—经济范式”、布尔迪厄的“场域”以及福柯的“装置”等类似概念的关系。¹接下来的四章将对四种主要安全文化的谱系或曰演化过程展开初步探讨。

第二章探讨的是“地缘政治”这一安全文化，将勾勒出在民族国家和常备军兴起的过程中该安全文化的源起。我将表明在后冷战时代，无论是就军费开支的规模而言，还是就占国家安全话语的比重而言，地缘政治依旧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安全文化。然而，尽管地缘政治在安全机构和安全话语这两方面依旧保持着主导地位，但我认为安全行动却变得越来越具有“生物政治”性，而非“地缘政治”性。也就是说，对军事实力的占有或使用更多地与掌控人口而非攻城略地相关。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权力投射的主要形式是“交往性”的，权力是通过展示人们普遍认定的那些权力工具得以操演的。但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军事力量被用于针对民众，而不是别的军事力量，例如针对平民或是恐怖分子。

1 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领土、权威、权利：从中世纪到全球集聚》（*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阿德勒、普利奥：《全球行动》；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弗朗西斯科·卢卡（Francisco Louca）：《时光飞逝：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As Time Goes B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区分：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劳特利奇出版社，1979年；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肉体的忏悔”（“The Confession of the Flesh”），科林·戈登（Colin Gordon）主编：《权力/知识访谈选集及其他作品》（*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哈维斯特出版社，1980年，第194至228页。

第三章探讨的是“新型战争”这一安全文化，将新型战争的演化过程追溯到了二战结束后的非常规战争。新型战争被视为与政治及军事角逐不同的一种安全文化，以解释这种安全文化为何能够长期存在并扩散开来。在这一章中，我将描述新型战争是如何不断发生变化的，以及该文化是如何与其他各种安全文化互动的。于是，新型战争与自由主义和平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混合型和平，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不稳定的和平；在这样的和平局面中，交战的各方依旧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为体。新型战争与地缘政治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乌克兰那种混合型战争。新型战争与反恐战争互动的结果则是圣战的扩散。

第四章探讨的是“自由主义和平”，这是一种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与联合国、欧盟或非盟等国际机构联系在一起的安全文化。本章探讨了与自由主义和平及其各成分——例如人道主义、促成和平及维持和平——相关的矛盾与困境。作为一种安全文化的自由主义和平，依旧仰仗于过去那种战争或地缘政治思维，其基础理念源自传统的和平观，而这种和平观是作为对 18、19、20 世纪欧陆战争的反应被提出的。我们能够观察到，在传统的和平观与源自经验及由本地公民社会团体提出的新型倡议之间存在着持久的紧张关系。新的可能性正是显现于这一紧张关系之中。

第五章探讨的是“反恐战争”。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一场战争，不如说是一种新型的远程追捕行动。反恐战争最初是由地缘政治塑造的，但它已演变成一种采用专门策略（例如，大规模监视、根据一套算法和技术标准进行识别尤其是由无人机进行的空中轰炸，以及特种部队突袭）的独特安全文化，并且还形成了专注于此的一套基础设施，包括大量情报机构、私人安保承包商及特种部队。反恐战争与恐怖一同催生了一种普遍的不安感。反恐战争与新型战争结合起来，构成了发生在当下的比 20 世纪式战争“更多之物”。

第六章的标题是“地理”。本章探讨的是各种全球安全文化在具体环境中有何表现。这一章提及了我们进行“转型中的安全”研究项目时研究过的三个地点——波黑、阿富汗和叙利亚。波黑是结合了新型战争与自由主义和平的混合型和平的典型代表；阿富汗是